

红色阅读

元帅交往实录



■ 于俊道
主编

刘伯承 交往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红色阅读

元帅交往实录

于俊道 ■ 主编

刘伯承交往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伯承交往纪实 / 于俊道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161 - 5715 - 2

I. ①刘… II. ①于… III. ①刘伯承(1892~1986)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312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斌
特约编辑 谢国龙
责任校对 刘小军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16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刘伯承和周恩来 陈石平	1
布衣元帅 金兰之交——刘伯承和朱德 陈石平	6
“同伯承一起共事,我们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刘伯承和邓小平 谢 戈 王秀英	19
“万家生佛拜将军”——刘伯承和吴玉章 王宗伯	31
“他的心里装的只有党的事业,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刘伯承和陈毅 甘耀稷	42
“一二九师变了”——刘伯承和徐向前 谢武申	52
“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刘伯承和叶剑英 蔡仁照	56
“他年轻有为,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刘伯承和左权 谢 戈	63
“真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刘伯承和陈赓 郭若冰	76
“我还是不要一点特殊化”——刘伯承和李达 谢 戈 王 英	82
“你们年纪轻,好好干吧!”——刘伯承和萧克 岳 明	88
在刘伯承的领导下 伍修权	90
“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刘伯承和孔从洲 李 屏	93

“指挥是向刘帅学的”——刘伯承和王近山 孙 国	95
“没有文化是干不好革命的”——刘伯承和何正文 郑 欧	101
“老院长做学问,钻研问题真是细致入微啊”——刘伯承和陶汉章 齐生平	106
泸州起义的得力助手——刘伯承和许剑霜 李克猷	109
“公交问题,公事公断”——刘伯承和张仲明 陈石平 张茂峰 康景海	110
彝海结盟——刘伯承和小叶丹 宋 科	113
“抬上他走”——刘伯承和周鉴 陈石平 张茂峰 康景海	116
“你骑上我的骡子走怎么样” 李振山	119
好兵不用多,一个顶十个——刘伯承和白高山 岑 平	121
在实际工作中教育和提高干部——刘伯承和田牧 墨 云	124
“没有群众基础要打游击怎么行呢”?——刘伯承和陈荒煤 储子德	126
“刘师长把心都扒给我们了呀!”——刘伯承和石志本 陈石平 张茂峰 康景海	129
“打仗,时间观念非常重要”——刘伯承和崔维庭 李士兵	131
“战争时期,执行命令第一” 张生华	135
“人民战士要经得起各种考验” 张镜霖	139

忘不掉的一段往事	焦立中	144
“战士是不用眼泪求战的”	曾克	146
“看到字,就像见到你们一样”	刘锐夫	148
“谈谈我们二野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吧”	金凤	153
“干我们这一行当,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一字之差,会死人的”	王文治	159
“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刘伯承和胡奇坤	初雨	164
刘帅古稀之年接见我	朱德炘	167
不忘革命有功人——刘伯承和徐宝珍	刘盛福	170
“他已经当了国民党特务,我不能见他”——刘伯承和乔茂才	陈石平 张茂峰 康景海	173
革命的忠诚伴侣——刘伯承和汪荣华	陈明义	178
“太行是老大,不能带这个头”——刘伯承和刘太行	陈石平	184
“我所希望的,就是看到你成长为一个能够克服困难的人”——刘伯承和刘蒙	盖边	186
“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刘伯承和考尔	陈石平 张茂峰 康景海	197
编后记		201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

——刘伯承和周恩来

1950年夏，刘伯承得知中央军委准备创办陆大的消息后，心里非常高兴。他给党中央写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诚恳地写道：“……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如果世上真有“缘分”一说，恐怕这就是“缘分”了。

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后作出的决定。而归根到底，则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军事院校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刘伯承一到北京，便投入紧张的工作。首先是确定陆大的校址。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建在东北。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刘伯承经过两次勘查地形，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营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建议：陆大的校舍暂时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他的意见得到筹委会的赞同。

这个地方选在哪里好呢？

刘伯承想起了进占南京后华东军区军政大学所在地。

华东军大设在南京紫金山下，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院内绿树成荫，操场开阔，各方面条件较好。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开进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并向党中央专门作过汇报。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这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所以，他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

党中央对创办陆大非常关心。在筹备期间，周恩来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法、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作了重要指示。

第一次是在11月初，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去研究。

刘伯承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1926年7月在广州。翌年夏，刘伯承曾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为其襄助戎机、擘画军事，担任参谋团参谋长，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很尊重，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时候，周恩来刚刚起床，还没有吃早饭。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从天黑一直亮到黎明。他深情地说：“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是睡久了。听说你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劳累了！”

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习惯了。”

一会儿，服务员端来早饭请周恩来用餐。趁此机会，客人们环顾了主人的住所：古老的庭院，已经破旧。北房五间，是会客室和办公室。房间陈旧，设备简单，里面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

靠墙排满了书柜，三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还有几把椅子。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再看主人的早餐：三块烤馒头片、一盘咸菜、一杯牛奶和一个鸡蛋。这一切表明，住进北京城中南海的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

作风。

周恩来吃完早饭，谈话开始了。

“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刘伯承微笑着向周恩来说。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就来。”周恩来用非常满意的口气回答。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刘伯承谦逊地说。

“你搞得好，搞得好。你有几个特长：你有学问，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在笑声中周恩来再一次鼓励他。

“总理，可不能那么讲，我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能力实在不足，过去搞红大，那个好搞，两三个月就过去了。现在搞现代化，我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几个好助手？”刘伯承诚恳地提出要求。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和刘伯承一起，详细研究了陆大的组织机构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这次会见，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因周恩来要接见外宾，谈话就结束了。

几天以后，周恩来第二次会见了刘伯承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

刘伯承一边听一边记，还不时地点头，像小学生上课一样认真、仔细，唯恐有所遗漏。

最后，周恩来还告诉他们，为了办好陆大，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外国顾问帮助工作。

听到这里，刘伯承不由一愣，腾地站起来。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话一点不假。

一提到外国顾问，刘伯承就想起1933年，他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工作的情景。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往事记忆犹新，从刘伯承的内心来讲，是不愿意要这些顾问先生的，谁乐意拿把木枷往自己脖子上套呢？但组织的决定又不好不服从，刘伯承



向周恩来建议：

“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周恩来对顾问的历史相当清楚，也吃过不少苦头，听了刘伯承这番话，他连忙说：“对，对，叫专家好。”为此，国务院还专门发过一个通知，统一对外国专家的称呼。通知指出：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仍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请来华的和过去非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一律称呼“专家”。

办学校是一件过细的事，周恩来还和刘伯承等人研究了筹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事宜：一是校名问题。鉴于将来要开办海、空军科，刘伯承建议将陆大定名为军事学院。二是校址问题。为了早日开学，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刘伯承提出把校址暂时设在南京华东军大所在地。以后有条件营建新校舍后再行搬迁。三是干部问题。当时朝鲜前线需要干部，新建立的各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需要干部，地方上各条战线也需要军队干部去支援。所以，从全军调干部很困难。刘伯承请求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一部分干部作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军事学院的各级机构。这些意见，周恩来完全赞同。

当谈话结束，刘伯承等人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亲切地问道：“刘老，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吗？”

这时，刘伯承用试探的口气说：“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老总来兼政委呢？”

总理不愧是总理，他看出了刘伯承的心思：要请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兼学院政委，一为尊重“父母官”，二为取得财力等方面的支持。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老总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周恩来坦率地说穿了刘伯承的心思。

“是啊！我是有这个‘坏’意思。”刘伯承一面回答，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周围的同志也哈哈大笑起来。

“这倒不是什么坏意思。你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晓得他干不干呢？”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可否。

“你叫他干他就会干的。”刘伯承想尽量争取周恩来同意。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那也不好勉强。你和他商量一下，他愿意干，你说好就是了，中央同意。”这件事后来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华东军区和陈毅司令员，无论在人力上，还是物力财力上，都给予巨大的支援，使军事学院得以顺利地创建和不断发展起来。

以后周恩来又就如何办好军事学院问题，在中南海西花厅和刘伯承等人作了3个多小时的长谈。

他们首先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军事、政治、文化教育都搞些什么，如何搞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指出我们的干部文化低，这是历史造成的。只有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接着，又研究了教员问题。最后，周恩来勉励刘伯承说，搞现代化军队建设，许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验。虽然刘老是个老教育家，搞了很久了，但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也还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将刘伯承等人送出西花厅，一一握手告别。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中南海显得格外宁静、安谧。但是，这里，那里，一座座庭院仍然放射出明亮的灯光。这些灯光映照在湖面上，投射出一片片闪烁的、波动的、摇曳的光影。

回到住所，刘伯承根据周恩来三次谈话的精神，和筹委会的同志们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1950年11月13日晚，刘伯承带着这个意见书，又一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向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作详细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后改为总政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代总长聂荣臻、军训部长萧克、总政副主任萧华和总干部副部长赖传珠等。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他把座椅搬到他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前面，背对写字台，面对大家坐下来。然后，拿起意见书，他读一条让大家讨论一条。遇到有修改补充的地方，他就转过身，伏在写字台上，随手记下来。

就在这一天的深夜，在周恩来主持下，产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第一份历史性文件，绘出了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高级军事院校建设的蓝图。

这份由刘伯承起草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由周恩来主持修改后，上报中央。三天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开始了筹建工作的新阶段。

（陈石平）

布衣元帅 金兰之交

——刘伯承和朱德

1916年初，中国西南大地爆发了一场战争——护国战争。

参加这场战争的两位青年军官——朱德和刘伯承，虽然他们素不相识，却在向同一敌人——袁世凯的北洋军进行战斗。

历史往往有许多巧合。一场战争把川军和滇军，把刘伯承和朱德联系到了一起。

兵戈相见不容情

说起来也许有人不太相信——3年后，川军、滇军反目成仇，刘伯承和朱德一度率领所部，面对面地展开厮杀……

那是在本世纪前期，川、滇军在联手取得护国、护法战争胜利之后，随着北洋军阀势力在四川的暂时消退，云集在巴山蜀水间的数十万川、滇、黔军，为着各自的利益，展开着激烈的角逐。

四川、云南、贵州的军阀之间本来就有着利害冲突，北洋军阀又多次挑起三方的争斗，以便从中渔利。原先属于革命阵营的力量内部也矛盾重重，这些就使得当时的政治斗争更加错综复杂。川军首领熊克武虽然声称诚心诚意与孙中山合作，却又常为时局和利害关系所左右，被时人议论为“坐北朝南”、阴谋称雄四川的大军阀。势单力薄的孙中山先生，一时也轻信了某些政客的谗言，采取了某些欠妥的策略将熊克武撇在一边。1920年3月17日云南军阀首领致电唐继尧商讨讨伐熊克武的计划。到5月初，一心

想做“西南王”的唐继尧便借此作为旗帜，就任川滇黔靖国军总司令，统率“倒熊”各军，后来发展为颇具规模的“倒熊”战争。

饶有兴味的是，在开战之前，川、滇两军都同意进行一次谈判。熊克武特派刘伯承为谈判代表。尽管这项使命的前景十分黯淡，后来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却在刘伯承的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因为谈判的对手是在滇军中担任旅长的朱德。

刘伯承早就得知朱德出生在四川东北部山区的仪陇县，和自己一样是布衣出身。朱德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早已名驰西南。尤其是护国战争中的泸纳之役，“朱支队”赫赫战功，更是威震巴蜀。见面之后，刘伯承亲眼看到这位青年旅长敦厚、朴实，待人和蔼，内心更加敬重，便毫无戒心地攀谈起来；“听说朱旅长是我们同乡？”

“要不是隔条巴水河，就跟你那个开县碰到一块儿了。既是同乡，就叫我朱玉阶为好。”朱德憨厚地回话。

“云南讲武堂真是出将才的地方，蔡锷将军的治兵方略确是高人一筹。”刘伯承好像不是专门来谈判，倒像是登门探讨论兵之道。

朱德也略知刘伯承为人诚恳，博学多才，是川军中初露锋芒的猛将。所以，也像讲家常一样，摆起“龙门阵”来：“重庆将弁学堂也是人才荟萃的学府哟。伯承兄熟谙孙子兵法，讲求势险、节短，我们早有所闻。当年丰都一仗，对我们川南决战可是帮了大忙呀，蔡锷将军多次提到你。”

“我刘伯承没啥本领哟，给蔡将军打配合也没有打好，右眼都让北洋军打瞎了，这‘一箭之仇’我是忘不了的。如今袁世凯早死了，可这仗还在没完没了地打，苦了四川的老百姓啊。”

谈到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两人颇有唏嘘之感。朱德接着说：“我这个四川人，在滇军里头带兵，回到四川又成客军啰。就是不打仗，老百姓还得花好多血汗来养活当兵的。开起仗来，更是十室九空，处处狼烟啊！”

两个人像知心朋友一样，谈论着四川局势、国家的前途、民众的命运，以及个人的抱负。当进入实质性谈判的时候，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讨价还价，互不相让。因为双方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又有种种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原因，只好靠枪炮来解决复杂的矛盾。刘伯承、朱德互道珍重之后，又回到各自的防区和阵地。后历经几月血战，双方互有胜负，军力不相上下。



关于这一段故事，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记述说：

“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朱将军谈起了有关刘伯承的事。‘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陷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的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以后，朱德出国留学，寻找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承亦几番周折，也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泸顺、南昌重携手

时间又过了六七年，两位布衣将军又见面了。地点还是在四川。

在1926年夏秋间，北伐战争爆发，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上，和创建由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在四川泸州、顺庆组织武装起义。

为着组织和发动起义，刘伯承同朱德在四川万县渡过了几十个日日夜夜。

1926年7月中旬，朱德回国以后，即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商谈四川军事，并多次同国共两党的军事情报人员开会进行研究。在中共中央的整个设想中，曾把万县当作开展军事运动的突破口之一，试图用较为和平的方式拉出一股力量。因为朱德与杨森曾在滇军中共过事，有旧的关系。当年朱德出国时，杨就“许诺”请朱德回国后主掌参谋部并兼一师师长，以报答救命之恩。基于这种“特殊”历史关系，中共中央派朱德前往杨森部工作，在8月底到达万县。见面以后，杨森信誓旦旦地表白一番如何渴望参加国民革命，接着就大开海口要钱要枪，对早年的“许诺”却闭口不谈。朱德正告杨森：钱和枪都没有，但是国民革命一定要胜利！你如果不真心实意地参加过来，还想侧击北伐军，你就毫无前途。

当北伐军占领武汉，迈出武胜关的时候，杨森似乎对吴佩孚的信心动摇起来。在朱德的教育和敦促下，表面上归服革命，还在行动上有所表现。可是，杨森一贯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伪装革命，背地里仍投靠北洋政府。在9月下旬，他借“出师北伐”为名，实际上派兵援助吴佩孚，乘隙进犯武汉。对杨森的这一工作虽未取得大的成功，但万县的试探，仍有一定的

实践意义——它使泸州、顺庆起义选择了在党的领导下，举行大规模兵暴的形式。

刘伯承抵达万县以后，即在原“宝隆洋行”朱德办公处开秘密会议，分析万县形势和全川军事。当时朱德在万县任杨森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并代理该军政治部主任。朱德说：“杨森秉性奸狡，他不听我的话。”欧阳钦插话说：“不听话，喊杨森把印交出来。”朱德看透杨森的反动本质，严肃地说：“杨哪能交印。”

当时，杨森正在调兵遣将，大举进犯武汉，万县形势渐趋恶化。刘伯承关心地对朱德说：“玉阶兄，你住在万县是很危险的。要设法离开。”中共中央也一再电催朱德离开万县。但因工作脱不开身，朱德仍继续留在“虎穴”。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朱德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一面与杨森开展斗争，一面积极参加和领导即将爆发的泸州、顺庆起义。

1926年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重庆浮图关刘伯承同志家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会负责领导全川军事运动，统一指挥四川武装起义。这是加强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独立自主抓武装的一项重要措施。

第一次军委会，以泸州、顺庆起义为中心议题。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和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略构想和具体策略。

会议还确定刘伯承任起义军总指挥。

1926年12月初，泸顺起义爆发，12000余名军人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向北洋政府宣战，并坚持167天，为配合北伐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我党掌握武装力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刘伯承、朱德作为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同生死、共命运，结下难忘的战斗情谊。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实行所谓“分共”，“宁汉合流”已成定局。加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整个革命遭到巨大挫折。为挽救危局，朱德、刘伯承等根据党的决定前往江西南昌，领导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南昌的夏天，酷暑难当，刘伯承作为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又一次开始同朱德合作。在南昌，没有谁能比朱德更了解敌人方面的全面情况了。他

的公开身份是南昌的公安局长，又是军官教育团的团长，驻南昌国民党军的那些头头脑脑，绝大部分都是他原在滇军工作时的老同事。加上这几天他又有意识地观察了解，把南昌驻军各方面的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晚上，他把这些情况向恩来、伯承同志作了详详细细的汇报，并向恩来建议起义时应该如何进行战斗。

起义的时间越来越临近了，朱德也更忙了。他一方面要和刚刚开进南昌城的起义部队（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秘密接头；另一方面还要巧妙地去应付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当局各方面的人物。他要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要演得生动、逼真。

经过几天的准备，各项工作都基本就绪了，各起义部队也都有了明确的分工。朱德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部署了军官教育团起义时的行动方案，命令军官教育团在起义的战斗打响时，迅速解决附近的敌人。他自己，则要去完成前敌委员会交给他的另一项特殊的使命——“请客”！

7月31日的下午，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团团长沙泽明、二十四团团长沙日文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同时都收到了朱德请他们吃饭的请柬。三个人受宠若惊，欣喜异常。傍晚，他们都满面春风地赶来赴宴了。

宴会是为丰盛，主人又那样热情豪爽，大家越喝兴致越浓。9点过后，酒醉饭饱了。但大家兴犹未尽，朱德又提议打麻将，于是一场“竹战”又开始了。

朱德在同军阀们“竹战”，刘伯承则率参谋人员奔波在第一线，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正在加紧准备着。城里已经戒严，起义军总指挥部已经下达了“河山统一”的特殊口令。埋伏在各指定地点的起义军战士们，已把白毛巾缠在左臂上，电筒上贴上红十字条，快刀拔出皮鞘，子弹压进枪膛……

午夜2时，起义的枪声响了。刘伯承所统领的参谋团，协同各部起义军战士们从各个地区向预定目标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敌二十三、二十四两个主力团由于团长去赴宴还没有回来，失去指挥，结果很快地就被消灭了。其他的敌军也因毫无戒备，成批成批地作了起义军的俘虏。军官教育团按照朱德同志的布置也投入了搜索敌人的战斗。

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敌军3000多人被全部歼灭了。起义军指挥部的大楼上升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它象征着南昌起义的胜利，也宣告了人

民军队的诞生。

在起义的整个过程中，朱德同志不仅为起义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而且利用他特殊的身份和条件，麻痹和牵制了敌人的指挥官，为起义军顺利地消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两位布衣将军又一次在一起共同揭开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后来，南昌起义失败，他们又率部南撤，分别前往湖南、广东。朱德在湖南南部又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湘南暴动，并率队前往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开始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刘伯承则由香港、上海转赴苏联莫斯科留学。至于他们再会于井冈山共事，则是5年以后的事了。

万里征途赤胆心

1932年初春，刘伯承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瑞金之后，他很快就见到了阔别5年的朱德同志。两位老战友相见，畅叙了别后的情形。朱德同志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随后，朱德又引见了毛泽东、左权、周恩来同志。他向中央负责同志表示，愿意到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担任军事工作。可是，组织上却安排他到红军学校工作，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刘伯承担任了红军总参谋长，朱德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反“围剿”的战斗中，朱德在前线，刘伯承也到前线。朱德在指挥所，刘伯承便带参谋人员辅佐左右，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形影不离。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他照搬照套苏联军事教程和条令，推行军事教条主义，驱使红军与强大的敌人硬拼。

刘伯承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红军战士的生命，站在朱德同志一边与李德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1934年5月间，刘伯承严肃地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也会变成千古罪人！”

李德是个十分骄横的军人，他的回答照例是大发一顿脾气。最后，又以谩骂和嘲笑的口吻说：“你连一个参谋的水平都不如，亏你还进过伏龙芝